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研究成果
四川大学“985”三期平台“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ZHONGGUO XIBU NONGMU DIQU
CHENGSHI LISHI BIANQIAN YANJIU

中国西部农牧地区 城市历史变迁研究

何一民 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XIBU NONGMU DIQU
CHENGSHI LISHI BIANQIAN YANJIU

中国西部农牧地区
城市历史变迁研究

何一民 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肖 伟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迁研究 / 何一民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14-8840-9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城市发展—研究—中国
—近代 IV. ①F29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451 号

书名 中国西部农牧地区城市历史变迁研究

著 者 何一民 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840-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3. 375
字 数 35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 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前　　言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东中西部等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而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影响至关重要。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著名的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此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他们普遍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

正确认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城市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毫无疑问会受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有的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发生变化，人类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能力在增强，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依赖性也就有所减弱。如在农业时代人类对水资源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只能建立在江河湖泊之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类可以在没有水资源的沙漠、荒丘中建立城市，

如中国的克拉玛依市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都是建立在荒凉的石漠和戈壁地带。中国的首都北京尽管严重缺水，但人口规模接近2000万人，还在不断扩张，而华北地区相当部分城市也都严重缺水，如在农业时代，人们只能望天而叹，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却可以通过南水北调来解决水资源的短缺问题。因而城市的发展虽然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但在不同阶段影响却有所不同。

在80年前（1935年），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胡焕庸先生根据调查，提出了一条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他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指出：“自黑龙江之瑷珲（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唯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亿，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① 东南和西北两大板块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这条画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直线，后来被称之为“胡焕庸线”。在半个世纪后（1987年），胡焕庸先生再次根据中国政府于1982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对他此前所提的观点进行验证，同样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东南部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北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2000年，有研究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基本上变化不大，仍然是94.2%比5.8%。由此可见，“胡焕庸线”真实地反映了近百年间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规律。“胡焕庸线”提出不久，不少研究者即发现“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分布的分割线，而且也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民族居住分界线、农牧文化分

^①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前　　言

界线等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相关研究表明，“胡焕庸线”之所以存在，是与中国气象上的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有着直接的关系，两者高度重合。“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半湿润区、半干旱区的界线，是反映荒漠化最敏感的指示器之一，年降水量不足 400 毫米时，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此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人口稠密；此线西北方，人口密度低，是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世界，则以畜牧为经济基础，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① 因此，“胡焕庸线”既是中国人口分界线，也是自然地理分界线、民族地理分界线和贫困分界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虽然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济落后，人口稀疏，但也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如西藏、新疆、蒙古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作为人类文明形成标志之一的城市也出现较早。因而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并不是在自然地理环境较差的地方不能产生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工业文明的来临是否可以逾越“胡焕庸线”？现代城市文明是否能够破解“胡焕庸线”？2000 年，中共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正是要解决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进一步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并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2014 年 11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就提出了如何用新型城镇化破解“胡焕庸线”的命题，他指出：“我国 94% 的人口居住在东部 43% 的

^① 天苍：《工业文明也无法逾越的“胡焕庸线”》，《黄金时代》，2011 年，第 6 期。

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如果西部地区不发展，城市化发展落后，中国的整体现代化和城市化也难以实现。

要破解“胡焕庸线”，就需要在西部地区发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同时也需要加强对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东中部地区城市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对于西部地区，尤其是藏、新、蒙地区的城市发展研究十分薄弱。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开始兴起，研究成果斐然，但较少有人关注西部民族地区城市的历史变迁。而中国的西部地区占中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人口数量虽然较少，民族的数量却相当多，中国除汉族之外的几个大民族如藏族、回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都集中居住在西部。因而研究中国城市历史，如果不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历史，这样的城市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于2000年以后，开始对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先后承担了教育部课题“20世纪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屋脊上的城市——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本书以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理论为指导，分多个专题对清代至民国时期西藏、新疆、蒙古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变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研究。本书为作者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内陆边疆城市史研究的论文选编，其中有多篇论文为新华文摘、人大报刊资料等转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本书是对其中部分论文的汇编，基本保持原样，略加以文字的修改和注释的完善。本书所载文章既有我个人撰写的，也有部分是与学生合作撰写的，这些都在每篇文末加以了说明。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研究成果，

前　　言

以及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四川大学“985”三期平台“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基地的出版资助。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四川大学出版社熊瑜社长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庄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并提出了若干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何一民

2015年4月12日

于四川大学竹林村竹林兰舍

目 录

清代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发展变迁	(1)
一、清代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2)
二、清代新疆城市的发展.....	(7)
三、清代蒙古地区城市发展.....	(17)
清代藏、新、蒙边疆城市发展滞后原因探析	(25)
一、脆弱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 影响甚大.....	(25)
二、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频发对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 影响突出.....	(29)
三、社会动乱与内外战争对城市的发展影响甚巨.....	(34)
四、落后的经济基础与生活方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39)
五、人口的数量与结构以及落后的观念对城市发展的 影响.....	(44)
论西藏城市的历史地位	(49)
一、西藏城市在区域发展历史中的地位.....	(49)
二、西藏城市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65)
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期与特点	(72)
一、西藏城市的孕育时期：从聚落到堡寨.....	(74)
二、从吐蕃王朝建立到分裂时期城市的曲折发展.....	(76)

三、从元朝到明朝城市的变迁	(78)
四、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复兴与发展	(80)
五、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	(83)
 西藏早期文明与聚落、城市的形成	(86)
一、西藏地区早期文明的起源	(86)
二、堡寨：西藏早期城市的雏形	(93)
三、部落联盟时期堡寨向城市的转型	(96)
 吐蕃元明时期西藏城市的兴衰	(104)
一、拉萨城市的建立	(104)
二、吐蕃时期拉萨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108)
三、吐蕃后期城市的演变	(113)
四、元明时期西藏城市的变迁	(115)
 清代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	(128)
一、西藏政治宗教中心的转移与拉萨再兴的原因	(128)
二、清代拉萨城市的重建与兴盛	(134)
三、日喀则、昌都等次中心城市的发展	(145)
四、商贸城市与边境城市的发展	(156)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169)
一、民国前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169)
二、十三世达赖改革与拉萨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	(177)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185)
 清代西藏城市体系的变化	(197)
一、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对城市体系的影响	(198)
二、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与变迁	(205)
三、西藏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	(217)

目 录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滞后原因考察.....	(222)
一、脆弱的自然环境成为制约西藏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226)
二、交通极为不便成为制约西藏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	(230)
三、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235)
四、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制约	(239)
五、宗教盛行对西藏城市发展造成严重制约.....	(244)
六、战争与社会动乱也严重制约了西藏城市的发展.....	(247)
新疆城市百年巨变：数量与规模.....	(251)
一、20世纪新疆城市数量的变化	(252)
二、20世纪新疆城市人口规模和建成区规模的变化	(262)
新疆城市百年巨变：结构与功能.....	(283)
一、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	(284)
二、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与变化.....	(295)
三、城市文化教育发展质量的变化与提升.....	(299)
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03)
近代南疆城市规模的变化与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309)
一、南疆西南部地区主要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变化	(310)
二、南疆东北部地区主要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变化	(320)
三、制约和影响南疆城市发展的原因.....	(327)
清末民国时期南疆地方行政建制改革与城市发展.....	(337)
一、晚清南疆地方行政建制改革与城市发展.....	(337)
二、民国时期南疆地方行政建制改革与城市发展.....	(347)

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上)	(356)
一、清代蒙古地区城市兴起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政治环境	(357)
二、国家安全战略影响下外蒙古城市的兴起	(361)
三、民族融合趋势下内蒙古城市的兴起	(367)
 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下)	(376)
四、清代内陆边疆蒙古地区城市规模、形态	(376)
五、清代内陆边疆蒙古地区城市变迁的动力特征	(391)
 清代民国时期汉蒙农牧交接带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	(398)
一、汉蒙农牧交接带的政治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	(398)
二、汉蒙农牧交接带交通区位变化与城镇发展	(402)
三、汉蒙农牧交接带产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商业贸易发展	(409)
结 语	(414)

清代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发展变迁

中国内陆边疆西藏、新疆、蒙古地区的城市虽然历史悠久，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城市的发展缺乏历史的连续性，相当部分城市的成长出现中断。清代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藏、新、蒙等地区的城市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有清一代，清王朝加强了对以部分重要边疆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开发，增设了若干地方建制，从而逐步在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了与内地基本相同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有效地实施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正是在清代，西藏、新疆、蒙古地区的城市出现较大的发展，初步奠定了 20 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但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西藏、新疆、蒙古等内陆边疆地区的城市发展仍然较为滞缓，对区域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

清代藏、新、蒙地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二是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相对较差，不少地区不适宜人类居住，因而人口数量较少。三是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以游牧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四是清代建立初期，这些地区的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较弱。由于清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各民族长期的经营和开发，到清后期，藏、新、蒙地区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但与同期内地其他省区城市发展相比较仍然相对迟

滞。五是藏、新、蒙地区城市具有与内地城市若干相同的特征，同时也有着与内地城市明显不同的特性，如边防性、军事性、民族性等，其城市复合特征更为突出。因而，深入探讨清代藏、新、蒙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试图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进行梳理，探寻历史表象后面的真相。

一、清代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西藏东接四川，东北临青海，北至新疆，西连克什米尔，南邻喜马拉雅山，出入于不丹、尼泊尔及英属印度阿桑等地，东则连云南之一部。

西藏历史悠久，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农业文明即在西藏兴起。大约在公元前 200~300 年，在西藏地区就开始出现早期城市文明^①。据《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载：“遍布各地之小邦，各据一城堡。”^② 这些堡寨在后来便发展成西藏最早的城市。唐王朝时期，吐蕃王国建立，推动了西藏城市的发展^③。“惹萨”（拉萨）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以大昭寺为中心的“惹萨”城市逐渐形成。吐蕃王朝覆亡后，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城市先后迁到萨迦、乃东、日喀则等地，“惹萨”随之荒凉^④。15 世纪初，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在拉萨周边先后兴建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使拉萨回归为藏区的宗教中心。17 世纪中叶，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固始汗的帮助下，在拉萨建立了

^① 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 年；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 年，第 486 页。

^②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27 页。

^③ 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 年，第 10 页。

^④ 陈耀东：《中国藏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页。

高度统一的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拉萨再次成为统一藏区的政治、宗教中心，继而发展成为藏区经济、贸易以及交通中心。

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前，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固始汗的军事帮助下，在拉萨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西藏地区结束了分裂的局面。清朝建立后，西藏被纳入到中国统一的版图，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继被顺治帝分封，接受清廷的管辖。清代西藏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个区域，康藏地区原属西藏，后改归内地^①。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西藏分裂、动乱局面的结束，为西藏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清二百余年间，西藏地区的城市有了较大的发展。

相比新疆、蒙古地区，清王朝对于西藏的开发和城市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相对要小一些。由于西藏远离内地，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高海拔的高原气候为一般人所不能适应，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使清王朝对西藏采取了不同于新疆、蒙古的管理模式。清廷在西藏除对国防、外交等重大事务以及重要官员的任命方面保持决定权外，其他地方事务则以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为主。因而在西藏的驻军和所直接派遣的官员较少。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清廷敕令在西藏要冲地方派驻少量军队，以维护地方稳定和保护内地与拉萨之间驿道的通畅，虽然清廷在西藏派兵驻兵形成制度，但规模一直很小^②。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建立西藏常备藏军3000名，前后藏各驻兵1000名，江孜、定日各驻兵500名，兵员从地方征调，登记造册，一式两份，分存驻藏大臣衙门和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同时，派遣1400名清军在西

① （清）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26，第10697～10698页。

② 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藏地方重要防区驻扎，藏汉军队由驻藏大臣统领。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创立清军驻防制度，建立正规藏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对于清廷加强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和维护地方安宁、抵御外敌入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西藏部分城市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清王朝对于西藏地区城市的政治推动作用相比内地要小得多，甚至比在新疆、蒙古都要小。

清代西藏大体上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个区域，康藏地区原属西藏，后改归四川^①。前藏地区以拉萨城为中心，分布有31城，据姚莹《前藏三十一城考》载：前藏城镇按照方位和相互关系分布如下：“刺萨、扎什、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垂佳普郎城、野而古城、达克匝城、则库城、满撮纳城、达喇马宗城、古鲁纳木吉牙城、硕噶城、朱木宗城、东顺城、则布拉刚城、纳城、吉尼城、日噶牛城、楚舒尔城、日喀尔城、公喀尔城、岳吉牙来杂城、多宗城、僧郭宗城、董郭尔城、地巴达克匝城、伦卡布宗城、墨鲁茶噶城、达多城。”^② 后藏地区以日喀则为首邑，班禅驻锡于此，为全藏第二大城市，另有林奔城、纳噶拉则城、拜的城、拜纳木城、日喀则季阳则城、乌尔科灵喀、丁吉牙城、罗西噶萨城、帕里宗城、盆苏克裘城、济隆城、尼娅拉木宗城、尚纳木林城、韦拉则城、章阿布林城等^③。噶大克为阿里部之首邑，据要地，被称为藏境西陲之锁钥。阿里地区地处偏远，与前后藏交通极为不便，人口较少，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

^① (清)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26，第10697~10698页。

^② 姚莹：《前藏三十一城考》，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③ [日]山县初男著：《西藏通览·区划》，四川西藏研究会出版，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

较少，规模较小。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阿里地区可称为城者主要有“阿里诸城：布拉木达克喇城，在布拉木之地，距喇萨西南二千五百余里，其所属有喀尔多木、日底二城。又古格扎什鲁木布则城，在喇萨西南二千四百九十余里，其所属有冲龙、则布龙、楚木尔的三城。拉达克城，在喇萨西南三千七百余里，其所属有扎石刚、丁木刚、喀式三城。毕底城，在喇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鲁多克城，在喇萨西北二千九百余里”^①。

清代西藏地区除拉萨、日喀则、亚东、江孜、噶大克、昌都外^②，其余被称为城的地方规模都较小，相当部分只是宗山城堡，严格讲不能称之为城市。这些宗山城堡主要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缺乏产业，缺乏文化机构，经济、文化功能较为薄弱，居住者较为单一。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开始任命文武官员入驻藏区，并在藏区各地主要城市逐渐建立了台站、衙署、哨所等，而内地的各种祠庙也先后被建立起来，这些祠庙至少包括三大类建筑，即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规模较大的城市还建有文昌帝君庙、观音阁、土地庙、火神庙、龙王庙、三官庙、川主庙、万寿宫等。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能对大部分城市的内部状况有详细了解，但是通过仅有的资料也可以看到清代西藏地区的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拉萨发展甚速，成为规模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拉萨在清以前一度衰落。清朝建立后，拉萨为前藏之首邑，达赖喇嘛驻锡地，因而不仅成为全藏之政教中心，而且也成为西藏的工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清代拉萨的发展，主要与它成为西藏的政教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拉萨除达赖喇嘛外，活佛高

^①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 547 《西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2003 年。

^② 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 年，第 42 页。